

“六经注我”与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

罗 立 乾

古书中每个字的意义，都有其用字的原义，不是任人雕塑的大理石。但封建社会的御用文人，如陆九渊之流，注释他们以前时代的古书，大都不顾古书用字的原义，想怎样注就怎样注，且美其名曰：“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。”这句话倒也说明，他们的注释，是以我的需要为出发的主观唯心论的做法。“四人帮”及其御用文人，大搞影射史学，制造篡党夺权舆论，也全盘承袭了“六经注我”的衣钵，鼓吹对历史和记载历史事实的古书，“可以随便给解释”，“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”。在他们的影射史学中，许多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美化自己的勾当，几乎都是用歪曲、篡改古书字义的做法干出来的。其手法很多，现择其一二，披露示众。

一是指鹿为马，无中生有。

“四人帮”及其御用文人在《孔丘其人》中，鼓噪孔丘当了鲁国代理宰相，就大搞复辟活动，恶毒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。孔丘代理宰相的说法，就是指鹿为马，无中生有，曲解古书字义的产物。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：孔丘在鲁定公与齐景公“会于夹谷”之时，“摄相事”；

又在鲁定公十四年，“由大司寇行摄相事”。这两处“摄相事”中的“相”字，虽指官职，但都非指“宰相”的官职，而是指诸侯国君在祭祀或会盟时，主持赞礼和司仪的职务。《左传·鲁定公十年》记载“孔丘相”。杜预在下面注明：“相，会议也。”《仪礼·聘礼疏》：“以孔子有德，君命使摄上宾。”就是说，孔丘最懂周礼，有“德行”，命他主持赞礼和司仪。也因孔丘最懂周礼，升为司寇后，仍兼主持赞礼和司仪。江永《乡党图考·鲁仕考》说：“按《家语》、《史记》皆云：为司寇行摄相事。其实，摄相乃是相礼，……未尝摄鲁相也。”而且，鲁国在春秋时，因季氏专权，根本没有设辅佐国君的“相”或“宰相”。范家相《家语证伪》说：《史记》“误以宾相之相为相国之相，不知鲁无相名”。鲁国无“宰相”，孔丘又何来代理宰相？“四人帮”为了借批孔以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，既指鹿为马，又无中生有。手段之卑鄙，罕有其匹。

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后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，中央通过，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。“四人帮”立即授意其黑笔杆，炮制《再论孔丘其人》一文，恶毒攻击

毛主席，攻击华国锋同志。他们在这篇黑文原稿上，特别注明“孔丘五十六岁由司寇代理宰相，管理司法工作”。梁效炮制的《“克己复礼”再批判》，则把“司寇”释为“公安部长”，把“摄相”释为“代总理”，极尽歪曲字义以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之能事。发表《再论孔丘其人》时，他们怕露马脚，删掉了“孔丘五十六岁由司寇代理宰相”等语，正暴露了他们歪曲字义以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的险恶用心。但他们在《再论孔丘其人》中，为了影射，还无中生有地曲解《论语·雍也》一段话中的“果”、“艺”二字。这段话是，季康子问孔丘：你学生仲由、端木赐、冉求“可使从政也欤？”孔丘回答：“由也果”、“赐也达”、“求也艺”，“于从政乎何有？”这里的“果”字，明明只说仲由“果断”，他们却释为仲由“大胆果断”；这里的“艺”字，明明只说冉求有“才能技艺”，他们却释为冉求“精通业务，是个内行”。他们曲解字义后，又骂孔丘“吹嘘自己的门徒”，“企图让他们去篡夺新兴地主阶级各方面的政权”。“四人帮”的“北门学士”，并非不懂训诂。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曲解，就是要将孔丘对仲由、冉求的赞扬，变成他们的黑话，恶毒攻击毛主席赞扬华国锋同志有领导县、地区、省的全面工作经验，又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；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自己的接班人；恶毒攻击敢于和“四人帮”作斗争的中央领导同志。

二是以今释古，信口雌黄。

“四人帮”及其御用文人，在他们炮制论孔丘杀少正卯的专著中，把代表新兴地

主阶级利益的少正卯，打扮成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“理论家”，以比拟“四人帮”自己，影射“宰相”一上台，“少正卯”式的“理论家”就要人头落地。他们笔下的少正卯，就是用以今释古、信口雌黄的做法，歪曲注释《荀子·宥坐》载孔丘杀少正卯的罪状搞出来的。

孔丘杀少正卯的一条罪状：“记丑而博”，明明只是说，少正卯“记录丑恶而且记得多”。他们却把“记”字释为“著作”，把“丑”字释为“类，即今语‘对立统一’”。然后，将这罪状说成是，“少正卯的著作及其中的判断或命题，其思想内容，乃是充满劳动人民变革精神的朴素对立统一理论。”其实，“记”字在这里并非指“著作”。他们引《释文》说“记”字曾作书名，以论证“记”有“著作”的意思。但《释文》却是说，“《记》，云老子所作”。即“记”字指书名，是专指老子的一本书叫《记》，并非泛指一切著作叫“记”。“丑”字在这里完全是“丑恶”的意思。《说文》：“丑，可恶也”。至于“丑”字虽有“类”的意思，但“类”的意思，是指“同类”、“相同”或“相等”，决非指“对立统一”。而少正卯又没有留下任何著作，仅据这个“丑”字，就断然说他的“著作”中充满朴素对立统一理论，这完全是信口雌黄，一派胡言，只有江湖骗子，才能撒这样的谎。尤其，在阶级社会里“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。”新兴地主阶级从它出世那天起，就剥削、压迫劳动人民。它与劳动人民的关系，即使是在封建社会萌芽时期，也是剥削与被剥削，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。少正卯代表新

兴地主阶级利益，如真有著作，也不会在其著作中，“充满劳动人民变革精神的朴素对立统一理论。”“四人帮”及其御用文人，这样卖劲地把少正卯装扮成劳动人民的代言人，正是他们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大暴露。

还更有甚者的是，本来孔丘杀少正卯的另一条罪状：“心达而险”，只是说，少正卯“内心奸滑而凶险”。可是，他们却把“心”字注为“世界观”，把“达”字注释为“地位显达”，又说“地位显达，就是要求掌握政权”，把“险”字注释为“倾覆”。然后，将这条罪状说成是，少正卯“力求掌握政权，以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，而倾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邦家”。其实，“心”字本指人的心脏。古人以为人是用心脏思维，“心”字由此派生出两个意义：一指思维器官，二指思想感情。这里的“心”字，指思想，与现代所说“存心不良”的“心”字同义。但“世界观”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观点、概念、观念的总和，古代“心”字哪有这个意义？并且，“心”字在这条罪状中是名词，作“达”的主语，而“达”字在这里作形容词，“奸滑”的意思。《字林》：“达，滑也”。“心达”就是“内心奸滑”。至于“险”字，唐人杨倞《荀子注》早已把它释为“凶险”。所以，对“心达而险”的解释，应该是“内心奸滑而凶险”。“四人帮”的“北门学士”，把“心达”这个主谓结构短语拆开来，孤零零地从“心”、“达”、“险”三个字中，注出上面那么多“微言大义”，岂不是“五四”以来批判

过的“索隐派”，又在“四人帮”及其“北门学士”身上，借尸还魂了吗？

“四人帮”御用的“北门学士”，在曲解孔丘杀少正卯的罪状时，还别有用心地插叙《吕览·离谓》对邓析事迹的记载：“郑国多相县以书者，子产令无县书，邓析致之；子产令无致书，邓析倚之。”并把这段记载中的“书”字释为“大字报”，把“倚”字释为“匿名散发”。胡说这段记载是说，郑国人“相率贴署名大字报”，“子产令无县书”，邓析就“将大字报送出去”；“子产令无致书”，邓析就“将大字报匿名散发出去”。其实，这里的“书”字是指“书写的刑法”，春秋时连纸都没有，哪有什么大字报？这里的“倚”字与后面的指示代词“之”相结合，是指“将刑法刻在石壁上”。他们这样以今释古，目的无非是，既攻击坚持革命原则的各级革命领导干部，又煽动和唆使牛鬼蛇神，到处贴反革命大字报，寄反革命匿名信，围攻各级党委和革命领导干部，搞乱社会，乱中夺权。

“四人帮”及其御用文人，明明是通过歪曲、篡改古书字义，去伪造史实，炮制影射史学，大造篡党夺权反革命舆论。可是，在他们的黑文中，却大量引证史料原文，注明原文出处，且还贴上各种“革命”标签，俨然言出有据，史实确凿，既以自炫，又以骗人。真是造假有方，“捣鬼有术”。但是，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。“四人帮”已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就正是他们造假捣鬼的必然下场。